

# 分包体制下建筑工人的 阶级经验和感情\*

潘毅 卢晖临 张慧鹏\*\*

**摘要** 改革开放 30 年，中国社会的经济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在生产领域，私营经济占据越来越大的比重，催生了一个新兴的工人阶级。建筑工人是中国新兴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本文将关注他们在分包劳动体制下，在日常生活中如何获得阶级经历和体验。

**关键词** 建筑工人 分包制 新兴工人阶级 阶级经验  
阶级感情

远看工地像天堂，  
近看工地像银行，  
走进工地像牢房，  
不如回家放牛羊；  
……

---

\* 本文作者对连佳佳、刘静、李大君、刘晓红、周丽娟、李庆素、小强、李丁和张劭颖等人为本研究成果所做出的贡献，表达万分的谢意。本研究受到以下课题的支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农民工群体的阶层形成和身份认同”（批准号：06CSH009），香港研究资助委员会（HKRGC）研究项目“一个新工人阶级的形成：对华南地区宿舍劳动体制下集体行动的研究”，北京大学—香港理工大学中国社会工作研究中心课题“新一代农民工的生活空间：阶级与公民意识的探索”。

\*\* 潘毅，博士，香港理工大学副教授（punngai@gmail.com）；卢晖临，博士，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张慧鹏，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硕士生。

搅拌机搅走我的青春，  
挖掘机挖走我的梦想，  
压路机压碎我的希望，  
电焊机也不能缝合我的悲伤。

——打工诗歌“我们的路在何方”（节选）

这首在网络上广为流传的打工诗歌，虽然语调诙谐幽默，却难掩沉重悲凉之情。工地被比喻为牢房，似乎有点耸人听闻，却是我们两年多来在建筑工地走访过程中所听到的、工人们普遍反映的感受。头顶的安全帽没有给超过4000万的建筑工人的生活带来安全保障，更没有带来英姿飒爽自豪感，相反，让他们感到异常的沉重。然而为了生活，他们不得不一次次地告别老婆孩子，告别温暖的家，来到荒芜的工地上打工，忍受着艰苦的工作和生活条件，用青春和汗水浇筑起城市的高楼大厦，最后换来的却是失望和悲伤。这就是当前建筑业层层分包体制下建筑工人集体遭遇的命运。

## 阶级经验与阶级感情

正如汤普森的论述，今天建筑工人的种种经历也是由他们所处的生产关系决定的。改革开放30年，中国社会的社会经济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在生产领域，私营经济占据越来越大的比重，催生了一个新兴的工人阶级。建筑工人是中国新兴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他们没有生产资料，完全靠出卖自己的劳动力争取工资收入，作为一个自在的工人阶级已经形成，然而他们又是如何看待他们自己的处境？

如果阶级经历主要是由生产关系决定的，阶级意识与生产关系之间的联系则要复杂得多。汤普森指出：

“阶级经历主要由生产关系所决定，人们在出生时就进入某种生产关系，或在以后被迫进入。阶级觉悟是把阶级经历用文化的方式加以处理，它体现在传统习惯、价值体系、思想观念和组织形式中。如果说经历是可以预先确定的，阶级意识却不然。”

汤普森指出，工人阶级不是一个抽象的存在，工人是有血有肉的具体

的人。工人阶级的形成并不是抽象的逻辑演绎，而是无数工人具体体验的结果。他强烈批判传统马克思主义对阶级所做的僵化的本质主义论断，主张回到具体的工人以及工人的具体经验去理解工人阶级的形成。他的著名论断是：工人在经验中形成阶级意识，走到一起，从自在的阶级转变成为一个自为的阶级。

当一批人从共同的经历中得出结论（不管这种经历是从前辈那里得来还是亲身体验），感到并明确说出他们之间有共同利益，他们的利益与其他人不同（而且常常对立）时，阶级就产生了（汤普森，2001：1~2）。

汤普森强调经验的重要性，指出工人在经验中形成阶级意识，但他并没有对阶级经验和阶级意识之间的关系做出很好的理论化阐述，因而遭到很多批评。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强调语言的中心性和主体的去中心化，在后结构主义者看来，没有了阶级语言作为话语中介，工人就没有办法将自己的经验理解为“阶级”经验（Somers，1994：623；卡夫雷拉，2008）。改革开放以来，国家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远离政治和意识形态的争论。在今天的中国，阶级话语已经找不到容身的空间了，阶级主体处在失语状态（潘毅，2005：96~97；潘毅、陈敬慈，2008：53~59）。主流的话语是发展、进步、与世界接轨，现代化的逻辑和新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占据主导地位。那么，是不是在阶级主体失语的状态下，建筑工人就无法体验到自己的“阶级”身份？当我们走进建筑工人具体而细微的生活当中，回到他们真实而鲜活的生命之中，去检视他们日常生活中的点滴经验，以及隐藏在内心深处的情感体验，可以发现，虽然没有合适的阶级语言，他们依然能够在日常生活的琐碎细节中体会到阶级的关系，萌生出阶级意识。

## “住工地就像住牢房”

2006年开春，河北进京高速公路上，一辆白色的金杯汽车跑得飞快，车厢里装满了大包小包，大军和他的老乡们随意坐在行李上，七嘴八舌地聊着即将在北京开始的打工生活。大军来自河北农村，还不满18岁，这是他第一次跟随老乡们到北京建筑工地上干活。不久车厢里变得安静起来，不知是谁突然冒出一句话“又去北京住牢房了！”于是气氛变得更加压抑

起来。此时的大军还不能明白这句话的含义，但仅仅几个小时之后，他就开始明白了。北京确实很大很漂亮，但这份繁华并不属于他。他跟城市擦肩而过，只是远远地看到城市光鲜的影子，来不及细细打量就被送到了工地上。城市安排给他的位置是在荒芜的郊外，而工地上条件之差超乎他的想象。大军在日记本上写下这样一段话：

“北京的大楼真是多，一栋挨着一栋，我在公交车上看得眼花缭乱。慢慢的，楼群少了，瓦房多了起来，街道也开始乱了，感觉还不如我们村子好呢！车很快停了，它就把我们卸到了这个地方，它开走了！我们扛着行李，住进一个很矮的白色房子。这屋子不是很大，但是竟然住了我们五十几个人。听说这就是我们在北京的住处。我渴了，这里却没有开水，现在真的好想吃一个家里的苹果啊，但看上去很难很难！”

相对于其他建筑工人，大军有较高的文化水平，这让他能够把自己的感受诉诸文字，让我们可以更好地走进他的内心世界，并通过他去体会建筑工人的情感。大军初二就辍学回家，因为年龄小，家里不放心让他出远门，先是在县城找活干，当过服务员，做过小生意，进过小工厂，但两年下来没挣到钱。大军听说工地上工资高，就想去工地干。

村子里在工地上干活的人很多，每到过年的时候，大大小小的包工头和带工就忙着在村子里招工人，工人也重新选择包工头。2006年年头，大军很容易就找到了工作，有包工头愿意要他，做小工，一天35块钱。大军很兴奋地跑回家告诉家人，家人说“去吧，挣够了钱，就给你盖房子结婚……”一连几天，大军都很兴奋，恨不得赶紧飞到北京，到大城市去看一看。去北京一路上他只顾憧憬美好的生活了，万万没有想到自己朝思暮想的北京竟然是这个样子。当他住进工地的那一刻，心顿时凉了一大半。这里住宿的条件实在是太差了，几十个人挤在一间房子里，随便一块木板就当床了。屋子里到处是灰土和垃圾，显然其他工人已经习惯于这种环境，没有人抱怨，也没有人打扫。在接下来的日子里，大军彻底领教了什么是“牢房生活”。

第二天正式开工。他们要建的是一个清洗火车车厢的洗车库。工地很小，周围都是铁路，他们首先要在这里挖地基。虽然还只是初春，但白天的天气已经非常热，大军感到脚下的路都是烫的。太阳底下，他和老乡二

三十个人挥舞着铁锹和大锤开工了，他把他们的工作比作和大地之间没有硝烟、只有尘土的战争，同时也是和自己的战争：

“因为挨着火车道，所以地面上全是小石子、厚土渣什么的，路面很硬，所以挖得不是很顺利。但是包工头在后面，没有办法，干吧，自己要表现得好一点啊！尽管无情的太阳把皮肤烤得炙热，黝黑的额头上的汗水已经滴落满地，但我没有放弃，我知道什么叫血汗钱了，我出来是挣血汗钱的，我不能放弃！”

在工地上，大军体会到了从未有过的艰苦。干活的时候，老板安排的工头在后面盯得很紧，稍不注意就会被骂。从年龄上来说大军还只是个孩子，但工地上不讲这些情理，每个人都得拼命干活儿，否则的话就滚蛋。这一刻，大军真正体会到了什么叫血汗钱。条件的艰苦并没有吓倒他，他倔犟的性格支撑着幼小的身躯，一天天坚持下去。十几天过去了，他们挖了一道道沟，手上磨起了一层厚厚的茧子。大军感到浑身酸疼，两条胳膊已经不听使唤，吃饭的时候拿起筷子的手都在止不住地颤抖。

很快地基挖好了，开始建筑主体的施工。主体建筑需要浇筑混凝土，需要很多人一起施工，而且浇筑的过程中不能停下来，否则质量就会受影响。于是大军和他的老乡就开始了没日没夜地拼命工作。加了整整一夜的班，又连续干了一整天，大军实在撑不下去了，他以为可以好好休息一下，但还没有走出工地，就被包工头给拦住了。“加班吧，今天晚上还有活儿！”大军不敢说什么，在工地上，一切都是老板说了算，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他刚来没几天，就已经深刻地认识到了。但他实在累得不行了，疲劳的身体驱使他鼓足勇气跟工头说自己想休息一下，但工头狠狠地教训了他“有活儿，让你们干就干，知道你们挣的是谁的钱吗？一会儿就把饭送过来了，工地上吃吧！谁想回去，那就别再过来了，要工钱，我这里可就没有了！”

包工头说完就转身走了，大军和几个工人在后面小声骂了几句，但还是没有一个敢回去休息。连睡觉的权利都被剥夺了，大军真切地体会到车上老乡的那番话，他感慨“这里真是合格的牢房！”

第一次来到大城市，大军总想出去走走，体验一下城市的生活，但他这个愿望一直都没有能够实现。工地在距离市区很远的郊外，吃住都在工地上。他们一天到晚都在工作，赶工期的时候要黑夜白天连轴转，连睡觉的时间都没有，更何况去逛街。即便有时间，身上也没有钱。原本说好了

每个月发一次工资，但已经过去一个半月了，大军和他的老乡都没有拿到一分工钱，只是每个人发了一两百块钱的生活费。钱很快花完了，包括从家里带来的零花钱，大军连买烟的钱都没有了。

工程总算结束了，一共两个多月，大军拿出记工本，看自己应该拿多少钱。3号4号下雨停工，0分；7号白天一天，晚上加班一个晚上，2个工；8号白天一天，晚上加班一晚上，2个工……一共干了54个工，挣了1000多块钱。但工头只给了他们每个人300块钱，说是剩下的钱等到年底才结算，到时候让带工（大军的老乡）带到他们老家去。大军和几个工人心里很不愿意，但始终没有勇气和老板闹翻。大军想回家了，早就想回家了。他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挣够盖房子结婚的钱，他甚至不知道这辈子有没有希望。

## 没有尊严的生活

大军只是中国几千万建筑工人的一个缩影，他的经历和体验为我们观照更广大的建筑工人群体的生存状态和情感体验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切入点。在两年多的调查研究过程中，我们走访了北京的五六个工地，接触了上千个建筑工人，他们的生存条件之差令人触目惊心。

在工地上，工人都是住在集体宿舍里。通常情况下工人的住宿区和工地紧挨在一起，有的工人甚至就住在刚刚建好的大楼的地下室里。这种集体宿舍体制给了资本管理和控制劳动极大的便利（任焰、潘毅，2006b: 124~134）。同一个包工队的人住在一起，包工头可以很方便地对其进行半军事化的管理，这确保了老板制定的工作时间表能顺利执行。

为了节约成本，建筑公司都会为工人安排最简陋的宿舍。不管工人住的是简易房还是工棚，条件都非常差。空置的厂房或仓库改造成的工人宿舍已经算是条件好的了，有些时候几块石棉瓦搭建的简陋工棚就可以住上百人。在北京的一个工地上，工人们住的地方之前竟然是养鸡场。这种房子既不能挡风，也不能遮雨，冬天寒风呼呼地灌进来，夏天则是成群的蚊蝇。宿舍里更是拥挤不堪。在北京的另一个工地上，一间大仓库被用木板隔成一个个格子间，就成了工人的宿舍。这个仓库大概有400平方米，最多的时候容纳了将近600名工人。做主体工程的时候需要的工人数量多，原来房间里的上下床已经容不下，公司就把床抬出去，用钢管和木板支起上下两层的大通铺，让工人们挤在一起。一个个狭小的格子间里，每个人只能蜷缩在自己的铺位上，连睡觉翻身都要小心翼翼，否则就会挤到别

人。而有的房间里，男女工人挤在一起，毫无个人空间可言。

住的条件差，吃的更差。在工地上，工人们只能在包工头的食堂里吃饭。因为工地上每个月只给工人发一两百块钱的生活费，剩下的都是只能在内部使用的饭票。一个工人的伙食标准通常是每天 10 块钱，算作工资的一部分，超出的部分从工资里面扣。虽然收费不低，但实际上，工人吃的非常差，没有肉，也没有油水，根本达不到 10 块钱的标准。在北京马连洼的一个工地上，工人们愤怒地向我们控诉，在工地上吃的连家里的猪和狗都不如。老板从市场上捡回来的烂菜叶，连洗都不洗，用水冲一下就放进锅里煮。

一个工地上往往集中了几百人甚至上千人，这样大规模的工人挤在狭小的生活区，而相应的公共设施则极为紧张。工地上尘土飞扬，身上很脏，干了一整天，出了一身的汗，往往连洗澡的地方都没有，甚至连开水都喝不上。在北京马连洼的一个工地上，1000 多名工人共用一个热水器，为了能喝上热水不得不排很长的队，并且经常为了打水发生争执，甚至于大打出手。

2009 年初，香港公益组织 SACOM 对香港上市公司新世界地产在内地的建筑工地进行了调查，列举出建筑公司的十大罪状，将建筑工人形象地比喻为 21 世纪的“包身工”（SACOM, 2009: 6-9）。根据我们的调查，这一称呼一点都不夸张。夏衍笔下的包身工被老板称做猪猡，任意殴打辱骂，没有一点做人的尊严，夏衍把他们称做 16 世纪的奴隶，而今天的建筑工人同样抱怨他们过的是猪一样的生活，老板根本不把工人当人看。

## 今非昔比：谁是劳动模范？

今天的建筑工人无疑处在历史上最恶劣的处境之中。包工头老李告诉我们，现在工地上越来越难找到年轻人，凡是能靠其他途径生存下去的，没有人愿意做建筑工人。作为中国新兴工人阶级的主体，国家已经正式承认了他们的工人阶级地位，然而在现实中，建筑工人的处境并没有多少改善。在工地上，我们经常听到工人们感慨自己“没文化”，只能“卖苦力”。他们用青春和汗水建起一座座高楼大厦，建起漂亮的城市，但并没有因此而获得社会的认可。

在改革开放之前的 30 年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宣扬的是劳动人民当家做主，强调劳动最光荣。国家致力于消灭三大差别，尤其是体脑差别，消除封建社会的职业等级观念。20 世纪 60 年代，更是强调干部和知识分子

必须培养阶级感情，向底层劳动人民学习，自我改造。在当时的主流意识形态里，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成员，不论从事什么工作，都是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做贡献。国家对人的意识进行改造，宣传革命只有分工不同，没有高低贵贱之分，越苦越累的工作越光荣。掏粪工人时传祥就是在那个时代被树立为学习的榜样。

时传祥作为旧社会的一个普通掏粪工人，长期受到粪霸的欺压，毫无社会地位可言。然而新中国成立后，时传祥翻身做了主人，党和国家给了掏粪工人高度的肯定。政府为了表示对他们的尊重，给了他们更高的工资，为了减轻劳动强度还为他们配置了粪车。新社会的时传祥带领班组勤奋工作，将工作效率大大提高，为首都创造了清洁的环境。他以主人翁的姿态，以“宁肯一人脏，换来万家净”的精神，肩背粪桶，走家串户，利用公休日为居民、机关和学校义务清理粪便、整修厕所。1955年，他被评为清洁工人先进生产者，1956年当选为崇文区人大代表，同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58年当选为北京市政协委员，1959年被选为全国劳动模范，参加了在北京召开的全国“群英会”。国家主席刘少奇在人民大会堂握着他的手，亲切地说“你掏大粪是人民勤务员，我当主席也是人民勤务员，这只是革命分工不同。”时传祥高兴地表示“我要永远听党的话，当一辈子掏粪工。”（谢涛，2006：19~20）

从此，时传祥成为载誉全国的著名劳动模范。《人民日报》等新闻单位都对他的事迹做了报道，宣传他吃苦耐劳的精神和崇高的思想境界。1964年，时传祥当选为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1966年国庆节前，时传祥被推选为北京市观礼团副团长，毛泽东特意把时传祥接进中南海小住。国庆节当天，时传祥作为贵宾被请上天安门城楼，参加国庆观礼活动。得知他没有文化，刘少奇特意送给他一支钢笔，鼓励他好好学习。当时担任北京市副市长的万里，也曾背起粪桶，跟着时传祥学习背粪，给环卫工人鼓气，一时间在北京城内传为佳话。

作为一个工作在最基层的普通掏粪工人，时传祥得到如此高的荣誉，是前所未有的。他被树立为劳动模范，是全国人民学习的榜样。这代表了国家意识形态的取向，也是一种打造新社会主义主体的行动。时传祥并不是一个特例，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全国涌现了大量的劳动模范，这些劳动模范都是奋战在生产一线普通工人，而且绝大多数是体力劳动者。时传祥是掏粪工人，王进喜是石油工人，孟泰是钢铁工人。他们无一例外在最艰苦的岗位上从事着最苦最累的工作。国家把他们评为劳动模范，既是对他们本人的肯定，也是对他们所代表的最基层的劳动者的肯定。劳动最



光荣，这是当时的主流价值观念。尽管认为这种主流价值观念一定深入人心未免过于天真，但毫无疑问，这种主流价值发挥着风向标的作用，它有助于提高劳动者的社会地位，有助于促进劳动者的自我肯定倾向。

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建筑行业虽然是艰苦行业，但建筑工人的地位并不像今天这样低。无论是城市的建设，还是工业的发展都离不开建筑业。建筑工人作为国家的主人有很高的生产积极性。李瑞环从建筑工人出身，走上国家领导人的岗位，张百发也从建筑工人成长为北京市市长。国家不但从一线工人中间培养和提拔领导干部，还注重对现有干部的思想改造，通过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干部和工人同吃同住同劳动等形式，反对干部的官僚化、特殊化，培养干部的无产阶级感情。总之，在整个社会主义时期，作为普通劳动者的地位是比较受重视的。

在今天，经历了30年的改革开放和市场化大潮的洗礼，社会主流观念已经发生了转变。劳动变成了纯粹的商品，并且是廉价的商品。今天，劳动模范这个称号还在沿用，劳动模范依然是光荣的称号，但评选劳动模范的标准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从1997年开始，私营企业家开始进入劳动模范的行列。<sup>①</sup>之后，越来越多的私营企业家、社会管理者阶层、娱乐和体育明星开始成为劳动模范，而普通工人的地位一落千丈，那些艰苦行业的工人更是被社会所遗弃，他们的劳动价值被严重贬低。

劳动模范是对工人阶级劳动的肯定，私营企业家成为“劳动模范”实在是一个莫大的讽刺。私营企业家所创造的财富，在很大程度上正是通过剥削工人的剩余价值实现的。一些主流的经济学家鼓吹企业家创造了社会财富，为社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在著名经济学家萧灼基看来，企业家并没有剥削价值，而是转移价值，将工人的剩余价值转移到社会领域，为社会做出了贡献。企业家从事的是一种管理劳动，管理劳动是一种复杂劳动，复杂劳动可以等于几十倍、几百倍甚至几千倍的简单劳动。所以资本家的管理劳动这种复杂劳动等于多少倍的简单劳动，这个倍数由市场来决定，市场上赚到多少钱，说明你管理劳动在复杂程度上比普通人高多少倍。按照这种逻辑，金钱成为衡量劳动价值的唯一标准，普通劳动者的劳动失去了价值。张维迎（2007：11）也有同样的论述，他认为任何一个国家最稀缺、最宝贵的资源就是企业家的才能，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之所以创造

---

<sup>①</sup> 1997年，在陕西省劳模评选中，5位私营企业家当选，其中包括《福布斯》杂志中国大陆排名前10的富豪。2002年，全国总工会评选“五一劳动奖章”和“五一劳动奖状”，有4名私营企业家获得表彰，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第一次。

出如此庞大的社会财富，是因为中国出现和成长起了一批企业家，他们推动了中国的高速发展，是社会最宝贵的人力资源，因此必须善待那些为社会做出贡献的人。在这些经济学家眼中，中国的经济“奇迹”完全归功于那些腰缠万贯的大老板，而普通工人没有什么价值，他们只是作为劳动力资源而存在。他们没有企业家的“本事”，只能去“卖苦力”，他们的苦力并不能创造多少社会价值，他们自然也不配得到社会的尊重。

## 今天的阶级感情

在和建筑工人长期的接触中，我们感受到工人最普遍的情感体验就是“恨”。恨老板太黑心，不把工人当人看；恨当官的不关心老百姓的疾苦；恨没有好的爹娘，不能出生在城市；恨自己没有好好读书，落到卖苦力的下场……这种强烈的“恨”的情感，与汤普森所说的阶级觉悟和阶级意识自然还有一段距离，但可以明白无误地将它视做一种（准）阶级感情。在艾拉·卡兹尼尔森（Katznelson, 1986: 12-21）看来，阶级感情是阶级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他将“阶级”概念分解成四个维度：阶级结构、阶级认同、阶级性情和集体行动，其中阶级性情或者说阶级感情对阶级意识和阶级行动的产生发挥着巨大的催化作用。“恨”是一种最常见的阶级感情，它是阶级意识的萌芽。在对韩国工人的阶级意识的分析中，具海根（2004: 170）对作为阶级感情的“恨”进行了精彩的分析：

“恨不是一种阶级语言，它并不是一种明确的结构化的意识，然而它是增强不公正意识和反抗精神的道德语言。恨是一种精神反抗语言，因为如果一个人接受了某种特定的局面，把它当做是自然的或道德上可以接受的，那么恨就不可能发生。这种恨是阶级意识的萌芽。”

在建筑工地上，工人和老板之间、工人和工人之间、工人和管理者之间普遍存在着老乡和朋友的关系，这种关系像一层含情脉脉的面纱，遮蔽了劳资雇佣关系。在一些学者（沈原，2007；周潇，2007）看来，这种“关系”构成一种“霸权”，使得工人和老板之间形成忠诚一庇护的关系，避免了血汗工厂的出现。但事实上，工人和老板之间有明确的界限，无论是工人还是老板都看得很清楚。最低一层的老板，只是承包了工程的劳务，他所有的利润都来自工人的劳动，工人就是他唯一的生产资料，从工人身上获取更多的剩余价值就是他的唯一目的。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在这

一层表现得淋漓尽致。即便工人和老板关系再好，也不可能超越他们之间的阶级界限。资本和劳动之间永远是对立的、不可调和的，而不管具体的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关系如何。

老刘是河南人，以前是一家国有企业的工人，后来企业改制，他被买断工龄，没有办法，只好到工地上打工。他的老板是一个朋友介绍的，他以为凭着朋友的关系，老板一定会给他很多照顾，但事实无情地打破了他的幻想。在马连洼的工地上，有一回，他连续工作了两天一夜，身体已经撑不住了，就找个地方休息了一会儿，没想到被老板发现，破口大骂，一点颜面都不给他留，这下他彻底明白了工人和老板之间的差别。老刘在国企的经历让他对事情有了更多的思索，他感慨现在世道真是变了。在国企的时候，国家试图用一套制度改造干部，让他们和群众打成一片，那时候工人和领导之间的差别远没有今天这么大。

## 身体的极限

建筑工人所干的是非常繁重的体力劳动。一天工作十几个小时，累得腰酸腿疼，不能动弹，第二天天还不亮就得起来。身体长期处在疲劳的状态，精力难以恢复。一个30多岁的建筑工人告诉我们，干建筑这一行，太苦太累，一到40岁身体就吃不消。而事实上，目前从事建筑行业的很多人年龄都在40岁以上。这些40多岁的中年人正处在人生中负担最重的时期，他们是家里的顶梁柱，肩负着一家人生活的重担。他们在工作当中展现出极大的忍耐力，用顽强的意志力支配自己的身体，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透支着体力，挑战着身体的极限，把潜能最大限度地发挥出来。如果要评选劳动模范的话，所有的建筑工人都可以称得上是劳动模范。他们每天、每周、每月的工作时间已经远远超出劳动法所规定的界限，甚至超出了身体所能够承受的极限。马克思在研究了18世纪的英国资本主义之后，指出资本对工人的剥削总是会遇到一个限度，一方面是劳动力身体的界限，另一方面是道德的界限（马克思，2004：267~269）。而对于中国的建筑工人来说，老板对工人的剥削好像永远没有止境，不但超越道德界限，而且超越劳动者身体的界限。

2009年3月20日，北京的建筑工地上，57岁的建筑工人薛富贵正抡着大锤砸石头。他的任务就是把大石头砸成小石块儿。老板安排了任务量，砸不完今天就算白干，明天干完才有工分。薛富贵一刻也不敢歇，像他这个年龄的人，能找个活儿干已经谢天谢地了，哪儿还敢讨价还价，一

一切都只能忍。北京的春天还很冷，他却干得满头大汗，把衣服脱了放在一边。从早晨6点到晚上6点，薛富贵就这样在工地上砸了一天的石头。到晚上，身体已经极度疲劳，累得说不出话来，吃完饭就睡觉了。

次日凌晨5点钟，工人们都陆续起来准备上工了，薛富贵却爬不起来，和他一起出来打工的弟弟薛富强问他怎么了，他说身体不舒服，让弟弟给请个假。中午吃饭的时候，薛富强回宿舍看哥哥，此时的薛富贵已经说不出话来，痛苦地抓挠着墙壁。薛富强赶紧去找班长，班长正在吃饭，让他去工地上的小卖部找车。等找到车，已是半小时之后，此时的薛富贵已经不省人事，送到附近的医院抢救了一个小时也没能挽救他的生命。

薛富贵就这样走了，悄无声息。工地上照旧机器轰鸣，很少有人知道薛富贵猝死的事情，即便听说了也不会放在心上。在这个社会上，一个农民工的死活太微不足道了。然而对于一个家庭来说，失去的是亲人和顶梁柱。

薛富贵的女儿薛小芳告诉我们，父亲是个很细心的人，每天收工后都要把一天干的活儿记下来。在他的遗物中有一个小小的记工本，上面密密麻麻地记着每天的工作时间和工作任务。建筑工地上的工作都是重体力活儿，年纪稍微大点就会感觉吃不消。而记工本上清楚地记着，已经57岁的薛富贵在工地上连续干了一个多月，中间没有休息过一天。

早晨5点起床，5点半集合点名，6点开工，11点半下班，中间1个小时吃饭时间，下午12点半上班，一直干到晚上6点。这是一个建筑工人在冬天的标准作息时间，夏天的天长，工作时间会更长，平均能够达到十一二个小时，还不算加班时间。没有星期天，没有节假日，薛富贵就这么日复一日坚持了30多天，可想而知，他的体力早已经严重透支，他的意志在强迫着他的身体，每一次上工地，都是对生命极限的挑战。最后，他终于倒下了，没能爬起来。或许，死亡，对他个人来说是最大的解脱。

## 异化体验

按照国民经济学的规律，工人在他的劳动对象中的异化表现在：工人生产得越多，他能够消费得越少；他创造价值越多，他自己越没有价值，越低贱；工人的产品越完美，工人自己越畸形；工人创造的对象越文明，工人自己越野蛮；劳动越有力量，工人越无力；劳动越机巧，工人越愚钝，越成为自然界的奴隶（马克思，1985：49）。

今天的建筑业，已经高度机械化和工业化了。然而技术的进步非但没

有把人从繁重的劳动中解放出来，反而加重了他们的负担。分工越来越细，大规模流水线作业对个人的技术依赖性越来越低。以前是精雕细琢，现在开发商最大的追求是速度。越早建成，越早卖钱。包工头老李在建筑行业干了十几年了，他对这个行业了如指掌，他感慨地说，现在中国人盖房子已经不顾及客观规律了，国外要建5年的工程，国内只要不到一年就竣工。现在盖楼的速度是平均5天一层，刚浇注的混凝土还没有凝固好，第二层就上去了。工程一动工，开发商就急红了眼，恨不得第二天就把房子盖好。工地上几乎每天都在赶工期，上边催下边，一层压一层，最后压到工人，老板恨不得用鞭子抽着你去干。在分工高度细化的情况下，工人只需要重复简单的动作，没有多少技术含量，劳动力的竞争从技术的竞争转移到体力的竞争。

斯科特的《弱者的武器》成书之后，学者们受其启发常常会关注工人日常的反抗。怠工和偷懒是最常见的反抗方式。工人都很机灵，他们也试图去偷懒，让疲劳的身体获得短暂的休息。这是一种无声的反抗。但这种反抗不能被无限夸大。事实上，老板比工人更狡猾。建筑工人通常是日工，干一天拿一天的工钱，但精于算计的老板依靠带工为每个工人安排了任务量。工人们都想着早点干完，多挤出一点休息时间，所以会拼命往前赶，开始了“赶工游戏”。他们也知道这样做只会让大家都累，但“谁都想早点下班，一开工就收不住了”。“今天安排三个人干这些活儿，你觉得干不完，就拼命干，结果到四五点钟就干完了，工头看见了，第二天给你安排两个人，你说这咋能干完啊？你又拼命干，结果又完成了。”这种管理方式把工人的潜力发挥到极致。他们创造了连自己都不敢相信的奇迹，他们不敢相信自己能完成这么大的任务量。在工地上，是带工帮助老板给每个工人分配任务。一个钢筋工告诉我们，经验丰富的带工已经将每一道工序计算出最大的工作量，确保每个工人都能发挥到极限。在工作的时候，工人是一口气都不敢喘，只想着把活干完，早点休息。对于那些年纪大的人来说，年轻人对他们构成了极大的挑战。他们的技术已经失去了价值，不得不去和年轻人拼体力。工人忙起来都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只能本能地去完成每个动作。劳动过程已经严重异化了。

不仅如此，工人与他们所创造的劳动产品之间也严重异化了。

在北京的工地上，很多工人来北京十来年了，他们亲眼见证了城市的扩展。刚来的时候三环还没连起来，现在四环都已经连成一片了。他们感慨着城市的发展速度，自己就参与其中，多少感到骄傲，但这份骄傲很快就变成了失落。不管城市如何繁荣，他们都只能徘徊在边缘，城市里永远

不会有他们的位置。我们还遇到过很多参与过奥运场馆建设的工人，他们因为能参与这场奥运盛会而兴奋。但奥运场馆建完之后，他们全部被清理出去。工人说，奥运期间为了保证场馆的安全，他们受到更为严格的审查。一个工人说，他和他的岗位就隔着一条警用线，一步就可以跨过去，但他不得不绕行半小时。他们因为自己参与奥运场馆的建筑而骄傲，但是没有办法去看一看自己亲手建起的大楼。人们会记住奥运会上精彩的开幕式、优秀的运动员、热情的观众，但不会有人想起他们。我们有机会看到一位鸟巢设计者的摄影集，在几年的时间里，他用照相机记载了鸟巢建设的整个过程。这位艺术家看鸟巢就像看自己的孩子一天天长大。但是，这份影集上没有一个工人。也许鸟巢的设计会因为其后现代的造型在艺术史上和建筑史上留下浓重的一笔，或许奥运会真的像媒体所报道的那样空前绝后，多年之后还会为人津津乐道，但这里面都没有建筑工人的影子，这座建筑、这座城市和他们无关，甚至这场盛会和他们也没有多大关系。

当前的中国，发展占据主流话语的核心，追求现代性成为不可置疑的价值选择。近代史百年国耻和曲折历程所压抑的民族情感终于在当下得到强烈的反弹。连续十几年的经济高速增长，激起国民心中蛰伏已久的大国情节，各种宏大的工程成为这种澎湃激情的表达。城市建设越来越追求力量的展示，越来越现代甚至后现代，同时也越来越远离日常生活，越来越成为芸芸众生只可远观的一道景观。

## “挨捞”：无法摆脱的命运

“我已经4天没有吃饭，睡也睡不着……我们多次想回老家，可是没有钱，如果有钱，就不用等在这里，死在这里。我们已经干了35天，一分钱没给，只拿了200块钱饭票，在他们的食堂吃饭，在他们的店里买东西，每样东西都比外面贵5毛钱。身上没有活钱，没法出去买东西……我们一共过来了六七十人，很多人走了，剩下的有二十七人，都是打电话回家，家里寄点钱过来，做路费。我们就是不想打电话回家，等着拿生活费。”

湖北籍工人薛富贵的老乡这样说。在北京马连洼的工地上，薛富贵死后，和他一起来打工的几个湖北老乡陷入了困境。他们都已经50多岁了，这是头一次出门打工，没想到外面的世界这么艰险。来之前，包工头信誓旦旦地向他们保证，给他们报销来回的车费，每个月发一次工资。然而他们干了一个多月了，没有发一分钱，更不用说报销路费了。薛富贵死后，

他们全部被无故辞退，公司不但不给他们发工钱，甚至连回家的路费都不给，他们困在工地上，不知道如何是好。一位老乡这样说：

“我们来的时候，没有说57岁不要，可是人都来了，他现在就说55岁以上的都不要，年纪太大。我今年头一年出来，我们种地种田挣不到钱，还不如出来打工……这里人相当多，是因为它（公司）原来有三个工地，另外两个工地没有开工，没有包到活，另外两个工地的人都到这个工地来，人少的时候，他什么也不说，人多的时候，就说57岁、60多岁的不能干。今天就说不给我们干活，不干活也可以，你把我们的工钱结清，我们就走，他不让我们干活又不给工钱，就说等几天，让我们等在这里，我们在这里至少一天吃饭就要14块钱，我们身上已经没钱。”

薛富贵的弟弟也已经50多岁了，瘦小的身材，一只眼睛还有残疾。哥哥死在工地上，公司态度蛮横，不肯给赔偿，还不给他们发工资，他感到非常气愤，后悔当初不应该出来。如今上当受骗，他觉得这个世界真是太黑暗了。现在他只想早点拿到工资，回老家去，“永远离开这个鬼地方”。

上当受骗是每个到建筑工地打工的人的必修课。作为农民工，他们被排斥在正规劳动力市场之外，老乡关系是工人唯一可以依赖的资源，工人都是靠着老乡关系找工作的，他们严重依赖老乡的网络。在层层分包的劳动体制下，他们只是给包工头干活儿，没有签订劳动合同，也就得不到任何正式制度的保障。关于工资工时工作任务等条件他们只能和包工头口头约定，而这些约定最后能不能兑现全凭包工头个人的信用。在建筑领域，工人唯一能够利用的就是传统的老乡和朋友关系，他们只能相信自己的老乡。老乡是自己人，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给老乡干活儿心里才踏实。工人靠着老乡关系找到工作，包工头也是通过老乡关系招到自己的工人。没有这层关系，就算包工头出的价钱再高，也很少有人敢跟着他干。而现实中，包工头的承包工程也是有风险的，这种建立在传统人际关系之上的信任常常经受不住风险的考验。当工程亏本，或者赚得比较少的情况下，一些包工头就不愿意兑现当初的承诺，千方百计克扣工人的工资。那些包工头往往在招工人的时候甜言蜜语，开出一张张空头支票，做出种种许诺，一旦工人上钩之后，包工头就凶相毕露。在建筑工地上，很少有工人能够长期跟着一个老板干的。老板会根据不同的工程调整工人的数量，工人也

会随时转移阵地，处于高度流动状态，而不管跟着哪个老板，被骗的风险总是存在的。用工人们的话来说，就是“天下乌鸦一般黑”。

在河北尧村，人们把上当受骗叫做“挨捞”。在放任的市场中，人们上过最多的课就是受骗，“挨捞”成为劳动主体转换必经的“洗礼”（rite of passage）。金钱至上的观念在推行层层盘剥的建筑行业当中发挥到了极致，发展出“大包吃小包，小包吃工人”的丛林生存状态。在尧村，我们看到，全方位的社会关系已经被化约为经济关系。在社会关系商品化的情况下，金钱成为衡量一切的尺度。人们为了经济利益，不惜破坏社会伦理。包工头可以为了赚钱而“捞”工人。过去乡土社会里熟人之间的信任关系在追讨工资的拉锯战中日渐消解（黄皓怡，2009）。

在尧村温暖的火炕旁边，带工张大叔面色沉重地回忆起自己多次受骗的经历。最近的一次是在2008年，他带着本村的六七十个工人跟着邻村的两个包工头出去打工。工钱没有结算，两个包工头联名打了一张欠条。当他拿着欠条追要工资时，两个包工头互相推诿，不了了之。他带出去的工人一直找他要钱，最后把他家里的毛驴偷走抵“债”。张大叔虽然和欠钱的包工头有亲戚关系，却也无可奈何。

## 路在何方？

建筑工人从事着最苦最累的工作，工作和生活条件之艰苦超出常人想象，但是为了养家糊口，工人们选择了忍受。用他们的话说，“咱出来就是来挣钱的，又不是来享受的，只要能拿到钱，别的什么都好说”。通常，建筑工人是家庭的顶梁柱，他们的工资是家庭的主要收入来源，关系到一家老小的生存，是名副其实的救命钱。与工厂工人相比，建筑工人收入较高，但那是顶严寒酷暑、经风吹日晒的血汗钱。建筑工人平时舍不得吃穿，就盼望着能够早日把工钱带回家。然而工地上常常出现的情况是，工人辛辛苦苦干了一年，到头来连工资都拿不到。老板的黑心把他们逼上绝路，社会的冷漠更让他们感到心寒。在极度绝望的情况下，很多人选择了爬塔吊，以死相威胁。对这样的情况，大军感叹道：

“走遍城市每个角落，打工的到处都有。当然偶尔还看见有人要从刚盖好的高楼上跳下来，他不是耍杂技，而是辛苦大半年的血汗钱不知道找谁要了。工人一趟一趟找公司，公司一次又一次把工人赶出来。全国成千上万个行业，有哪一个行业像工地上这样，工人干了活



不给钱，而且还强词夺理？现在，寒冬腊月，又到了一个公司欠薪工人讨薪的高发期，他们为别人建造了温暖的高楼大厦，自己却被赶了出来，在寒风中讨要自己一年的血汗钱，公司老板的冷漠比寒风还让人心寒啊！”

高飞是个年轻的建筑工人，已经在工地上做了六年的钢筋工。对于讨薪的经历，高飞有着深刻的体会：

“从我出来这些年，大大小小也到过几十个工地，生活条件有好有坏，这些还可以忍受，可是你干了一季或一年的活却拿不到工资。我想让谁也受不了，如果你去找劳动局的话，他们说你没签劳动合同，没办法管。可是你一去到街上或政府示威游行的话，劳动局和警察出面说：你们这是不对的，是违法行为，你们要通过正当法律手段来讨工资，可劳动局以没签合同为由推脱，这时真是叫天天不灵，叫地地不应啊！那时我们就想，什么时候我们的工资能像那些正式职员一样按时发放呢？”

2009年开春，大军离开河北老家，背负行囊，再一次踏上通往北京的路途。年复一年，类似的场景在中国大地、在数千万建筑工人身上一再重演。踏入城市的大军和千千万万建筑工人们一样忍受工地上极端艰苦的劳动和生活条件；不仅如此，在一个远离社会主义塑造阶级主体、宣扬阶级情感的时代，他们还处处受到歧视，并经历一个自我贬低、自我否定的痛苦心路历程。然而，在这一过程中，我们可以明白无误地看到，建筑工人们正不断累积各种虽然发散、但大体上都可以归入阶级体验的具体经验，并从这些经验中萌生或明确或模糊的阶级感情。

再过几个月，寒冷的冬天又将来临。大军将和千千万万的建筑工人一样踏上返乡的路途。没有人可以准确预测他们将以什么样的方式返回家乡，但可以肯定的是，他们背负回去的将不仅仅是沉重的行囊，还有难以排遣的疲惫和不满。还可以肯定的是，他们中的很多人怀揣的将不是一打人民币，而是记录他们一年辛苦的欠条，以及不断蓄积却又无以名状的失望、痛苦、愤怒和怨恨。我们知道，一定还有一些建筑工人将永远无法踏上返乡之路。他们从家乡走进城市，最后走上的是高高的塔吊。

路在何方？

## 参考文献

- 布迪厄, 2004, 《实践与反思: 反思社会学导引》, 李康、李猛译, 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
- 迪皮斯·查克拉芭提, 2005, 《工人阶级生活和工作状况的认知条件: 1890~1940年间加尔答的雇主、政府和黄麻工人》, 载刘健芝, 许兆麟编《庶民研究》, 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
- 黄皓怡, 2009, 《从熟悉到陌生: 乡缘关系在建筑业中的运用与败坏》, 北京大学学士论文。
- 具海根, 2004, 《韩国工人: 阶级形成的文化与政治》, 梁光严、张静译,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卡尔·波兰尼, 2007, 《大转型: 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 冯钢、刘阳译,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 罗丽莎, 2006, 《另类的现代性: 改革开放时代中国性别化的渴望》, 黄新译,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 马克思, 1985,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中共中央编译局译, 北京: 人民出版社。
- , 2004, 《资本论第一卷》, 中共中央编译局译, 北京: 人民出版社。
- 米格尔·卡夫雷拉, 2008, 《后社会史初探》, 李康中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 潘毅, 2005, 《阶级的失语与发声: 中国打工妹研究的一种理论视角》, 《开放时代》第2期。
- , 陈敬慈, 2008, 《阶级话语的消逝》, 《开放时代》第5期。
- , 卢晖临, 2009, 《谁更需要包工头》, 《南风窗》第5期。
- 任焰、潘毅, 2006a, 《工人主体性的实践——重述中国近代工人阶级的形成》, 《开放时代》第3期;
- 2006b, 《宿舍劳动体制: 劳动控制与抗争的另类空间》, 《开放时代》第3期。
- SACOM, 2009, 《建筑业农民工: 21世纪的“包身工”》, SACOM网站。
- 沈原, 2006, 《社会转型与工人阶级的再形成》, 《社会学研究》第2期。
- , 2007, 《“关系霸权”: 对建筑工劳动过程的一项研究》, 载沈原编《市场、阶级与社会: 转型社会学的关键议题》,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汤普森, 2001, 《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 钱乘旦等译,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 汪晖, 2007, 《去政治化的政治、霸权的多重构成与六十年代的消逝》, 《开放时代》第2期。
- 吴清军, 2006, 《西方工人阶级形成理论述评——立足中国转型时期的思考》, 《社会学研究》第2期
- 萧灼基, 2001, 《管理创造价值, 人才需要市场》, 《中国食品工业》第12期。
- 谢涛, 2006, 《劳模时传祥的坎坷人生》, 《文史月刊》第7期。
- 严海蓉, 2001, 《“素质”、“自我发展”和阶级的幽灵》, 《读书》第3期。
- 张维迎, 2007, 《歧视民营企业是对国家利益的损害》, 《当代经济》第2期(上)。

- 中国海员建设工会, 2005, 《直面农民工——建筑业农民工现状调查报告》, 《建筑》第2期。
- 周潇, 2007, 《“关系霸权”: 对建筑工劳动过程的一项研究》, 清华大学硕士论文。
- Barbalet, J. M. 1998, *Emotion, Social Theory, and Social Structure*, Cambridge, UK;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Katznelson, Ira 1986, “Working-Class Formation: Constructing Cases and Comparisons”, Ira Katznelson and Aristide R. Zolberg eds: *Working-Class Formation: Nineteenth-Century Patterns In Western Europe and The United States*,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Ngai, Pun & Lu Huilin, 2008a, *Incomplete Proletarianization: Self, Anger and Class Action of the Second Generation of Peasant-Workers in Reform China* (printed).
- Ngai, Pun & Lu Huilin, 2008b, *The Culture of Violence: The Labor Contract System and Collective Actions of Construction Workers In Post-socialist China* (printed).
- Somers, Margaret R. 1994, *The Narrative Constitution of Identity: A Relational and Network Approach*, *Theory and Society*, Vol. 23, No. 5, 605 – 649.

(责任编辑 张玉林)

*Articles*

Class experience and disposition of construction workers in labor subcontracting system

*Pun Ngai , Lu Huilin and Zhang Huipeng / 109*

Abstract: The economic structure of the Chinese society has been greatly transformed due to the thirty-years of reform. In the realm of production , alongside with the growth of private economy , capitalist mode of production gradually becomes the dominant form. There thus came a new working class , in which construction workers constitute a significant part. Concerning such a “class-in-itself” , we would like to explore how did this new working class understands itself and how could it transform itself from a “class-in-itself” into a “class-for-itself”. This article aims to illustrate how construction workers acquire their class experiences and dispositions in their working lives under the labor subcontracting system. Then ,based on the socialist discourse regarding “class sympathy” , the authors make a comparison between class experiences acquired in two different periods.

Key Words: construction workers; labor subcontracting system; new working class; class experience; class disposition

“Qi” and “the rich rule in village” in the context of social differentiation: taking E village in eastern Zhejiang province as an example

*Yuan Song and Chen Feng / 128*

Abstract: Villagers who have ever committed to socialist egalitarianism cannot accept the sharp differentiation in today’ s rural society as legitimate. Animosity between “the poor” and “the rich” increase everyday as they interact with each other. As a result ,social circle of the rich become more and more segregated from that of the poor. Meanwhile, “the rich rule in village” gradually becomes a prevailing principle in the current policy context that is heavily based in favor of GDP growth. The winners in market economy instinctively apply the efficiency-maximizing methods in which they run successful businesses to run village commonwealth ,which always implies the increasing exclusion of common villagers from participating in decision-making process. The case of E village shows how the contradiction between “public” and “private” and the conflict between “the rich” and “the poor” get entangled in rural daily life. Some villagers who despise village elites ’sense of superiority tend to call for the help of higher authorities instead of making appeal to the meeting of village self-ruling body. Besides ,the public realm in rural community is shrinking. In such a context ,the village self-ruling system that was established in the 1980s when rural social structure was basically “flat” is now becoming ever more questionable.